

正视历史才能 开创美好的未来

——论日本和德国在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
侵略罪行问题上的差异及其根源

宁鹏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半个多世纪。那场由日、德、意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全世界有84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先后被卷入战争，军队和民众伤亡总数超过1亿人，财产损失达4万亿美元。其中，日本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以上。日、德、意法西斯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作为发动战争的国家，战后理应对其侵略战争罪行进行深刻的反省，承担起特别的义务，尤其要教育年轻一代，勿忘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以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在这个问题上，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和德国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和思考。

在德国，尽管目前仍有新纳粹分子存在，但德国政府和大多数民众在关于二战中纳粹罪行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有着较为正确的立场。总的说来，德国敢于直面历史，勇于承担战争责任，对受害国家和人民坦诚相见，诚恳道歉，解囊赔偿；对战犯绳之以法，穷追猛打；对新法西斯严厉打击，警钟长鸣。从而不仅促进了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和解，也维护了德国自身的尊严。

与德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日本，尽管也有许多具有良知的人，对侵略战争表示了真诚的反

省和道歉。但日本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战后50多年来，没有对日本的侵略历史和滔天罪行进行过真正的反省和道歉；军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远远没有肃清，一些坚持“皇国史观”的人和少数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肆意歪曲和篡改历史，大肆进行翻案活动，极力美化军国主义，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否定天皇的战争责任，否定对战犯的审判，否定日军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暴行，为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这些现象不仅在日本社会各界时有发生，而且在日本议会和内阁成员中，也经常有人跳出来兴风作浪。

早在1951年9月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恢复独立国家地位后的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就一方面对外以和平条约第11条承认东京审判判决的形式，将战争责任问题降到最小范围；另一方面，对内则否认战争责任或者将这一至关重要问题模糊搁置起来，不再提起。之后，在日本右翼势力掀起一股逆流中，日本迫不及待地释放了全部战犯，对东京审判的翻案从此开始。1963年5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将每年的8月15日定为“终战纪念日”，在这一天全国各地都要举行追悼战争阵亡者的仪式。在当年的追悼仪式上，首相池田勇人的演说，避而不谈战争的性质，却大肆美化侵略者，鼓吹“阵亡者是国家今日繁荣的基础，要永志不忘”。六七十年代，日本的新

民族主义开始抬头, 尽管部分进步人士不断发掘出日本侵略的罪证, 对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观痛加批判, 但日本右翼势力仍顽固坚持其侵略立场, 公然推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使日本的翻案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82年6月5日, 日本文部省发布了对翌年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检查审定结果, 将原有的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入”, 将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改为“暴动”, 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同年11月上台的中曾根康弘, 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纲领主张, 鼓噪“不设禁区, 以新的想法、观点去如实地重新认识历史”, 即对东京审判和战后日本新宪法确定的象征天皇制、非军事化进行彻底清算, 否定东京审判, 否定新宪法或者至少取消宪法明确规定永远“放弃战争”的第二章, 不受限制地发展军事力量。1985年中曾根康弘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开提出要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 他将承认日本进行的战争的侵略性、加害性的见解斥责为“东京审判战争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 将反省称为“自虐思潮”。他还在当年的日本战败纪念日, 第一个公然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曾根之后的日本政府, 大都步其后尘。1996年, 日本自民党还要求去日本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参拜靖国神社。1998年8月, 小渊内阁21名成员中有13人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还利用文艺、报刊等制造军国主义舆论。日本自民党105名议员组成“历史研究委员会”, 编写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 极尽否认侵略历史、为侵略翻案之能事。日本摄制的《军阀》、《冲绳决战》、《山本五十六》等一系列影片, 极力美化阿南惟几、东条英机和山本五十六等战犯。1998年5月, 又公映美化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 并否认南京大屠杀, 宣扬日本无罪论。直至近日, 日本法务大臣中村政三郎还鼓吹, 要修改1947年5月实施的受到日本爱好和平国民欢迎的和平宪法中规定的永远放弃战争、不能拥有军队的规定。

日本和德国在反省二战侵略罪行问题上之所以出现明显差异,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

第一, 盟国对法西斯主义罪行的清算程度不同

德国二战失败是无条件投降, 元凶希特勒自杀, 其他战犯遭到严惩。战后, 根据《波茨坦会议议定书》的有关规定, 由苏、美、英、法派人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对德国纳粹进行了长达一年时间的审判, 盟军诉讼战犯7万人, 定罪判刑3.6万人, 西德诉讼8.5万人, 定罪6000人。一些漏网的纳粹战犯在战后德国如过街老鼠, 无处藏身, 不得不隐姓埋名, 流亡他乡, 以求苟存; 一经发现, 即缉拿归案, 决不宽宥。德国多数人从纽伦堡审判中逐渐省悟, 自觉地进行了一场民族自省运动, 认识到纳粹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铁铸的事实, 战争罪责问题是“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 不能无动于衷; 德国应正视痛苦的过去, 正确把握未来, 努力重塑民族精神。从而, 使德国走上了同过去侵略历史决裂的光明道路。

与此不同的是, 日本投降后, 美国实行对日单独占领, 一切事务都由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决定。盟军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 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 但美国出于冷战和反共的需要, 逐步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 极力扶植日本右翼势力, 停止执行追究战犯的政策, 草草结束了对战犯的整肃。中国虽是遭受日本侵略最严重的国家, 但在日本战败之时, 中国国力薄弱, 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听命于美国, 在如何处置日本问题上, 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 难对清算日本战争罪行起有效影响和监督作用。据统计, 1947年9月至11月, 占领军释放了24名重要战犯, 次年又释放了包括岸信介在内的19名战犯。至1951年底, 在整肃的21万余人中, 实际解除整肃的达20万人, 真正整肃的寥寥无几。解除整肃的大部分人, 非但没有改过自新, 反而重操旧业, 有的返回政界, 有的钻进军队(警察预备队、自卫队), 有的重建右翼组织, 成为战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火种和中坚力量。目前, 日本右翼团体约有700个约12万人, 并且仍呈不断扩大和增长的趋势。这些在美国庇护下重新崛起效忠于天皇的右翼团体, 本质上是日本战前右翼的延续, 他们人数虽然不多, 但能量不小, 影响较大, 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骨干力量。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 战后初期日本虽也提出全体国民都必须进行彻底的反省, 但其反省的内容, 非但不是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伤害, 而是“战败的原因不仅在于政府政策的错

误,还在于国民道德的沦丧”,要反战的国民对其失败负责。这样的反省,只能适得其反。

第二,战后政权建立的基础不同

战后德国政府是在抛弃法西斯政权、重建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国战败后,盟国管制委员会行使德国政府职能,德武装被全部解除,军事工业被摧毁,纳粹党及其附属与监管机构及纳粹组织被取缔,经济上也受到使经济分散等4条原则的限制。这些非军国主义化、非纳粹化、非卡特化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原则,对以后政府的政治走向产生着深远影响。政府领导人同纳粹之间非但没有共同的利益联系,而且有的还是纳粹的受害者,他们在对待战争责任等问题上,比较超脱,不轻易受右翼势力的影响。1953年,西德通过了第一部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法《联邦赔偿法》,规定对战争中受到政治、种族和宗教迫害的人给予赔偿的办法。据德国财政部战后处理司称,到1993年1月,德国对欧洲的战争赔款支付总额已达904.93亿马克。预计到2003年,德国支付的赔款将达到1222.65亿马克,约合580亿美元。德国政府重视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正确历史观的教育,不仅80年代以后的历史教科书毫无保留地记述纳粹罪行,而且还建立了纳粹暴行陈列馆,让更多的人深刻了解那段不应忘记的罪恶历史,开创新的未来。在德国,为侵略历史翻案不属于言论自由,1994年通过的法律规定,否认“奥斯维辛大屠杀”历史的人,可判5年徒刑。1995年,德国政府还同意拨款在勃兰登堡附近修建“欧洲被谋杀犹太人纪念碑”。

日本的情况却不一样。战后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它成为美国占领军的政策执行机构,作为统治国家的机器继续运转,没有受到实质的改变。日本近代天皇制是专制君主制,天皇总揽国家大权,是产生军国主义的基础。1926年2月上台的日本天皇裕仁,推动和指导了一连串的侵略战争,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最大的战犯,本应受到严惩,但在美国的庇护下,逃避了对其战争罪责的追究。尽管战后日本新宪法解除了天皇往日的大权,但由于天皇处于“日本国的象征”、“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这一特殊地位和日本国民对天皇的信仰,故天皇制的保留对于日本彻底追究战争责任,反省侵略战争罪行产生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日本战后

第一届政府是以东久迩为首的皇室内阁,接着是与皇室关系极深的币原喜重郎当政。此后担任首相的是旧官僚出身的吉田茂。他们都是旧体制的继承者。甲级战犯、曾在东条英机内阁中担任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的岸信介出狱后,在1955年组织合并成立了日本最大的、长期在日本执政的保守党——自民党。后来他还担任了日本首相。岸信介组阁时,其成员“从大臣到长官,曾被清洗的人数达到半数”。由这种人组成的日本政府,是不可能对过去的历史有正确的态度和立场的。

第三,历史文化传统不同

德国是“思想家王国”,其思想文化有着双重性质。19世纪初,普鲁士遭到外族统治,几近灭亡,又在反拿破仑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溃败,从而掀起了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在1813年的莱比锡大会战中打败了拿破仑,争得了普鲁士进而是德意志的新生。与此相应的精神品质是勤勉、忠诚、节俭、清廉等民主性和进步性因素。可以说,19世纪初的德国人还是热爱和平的。但到了19世纪后期,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被异化为“普鲁士精神”,即狂热的崇尚武力和军国主义。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统一,接着德国便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成为两次大战的策源地。德国法西斯几乎葬送了德国的文明,法西斯的战败才使德国人民觉醒,挽救了德意志的文明,德国哲学传统中理性的一面有助于它对法西斯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认罪。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都能以理性的思维对二战进行深刻反思。1951年9月27日,阿登纳总理声明,纳粹以德国人民名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国有义务进行物资赔偿,他还首先对法国郑重道歉,赢得了法国人民的宽容。1970年勃兰特总理出访波兰,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1985年5月8日,魏茨泽克总统在法西斯德国投降40周年纪念活动讲话中,毫不含糊地谴责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要求德国人永远牢记历史教训。他提出将5月8日“战败日”定为“解放日”,并达成了共识。赫尔佐克总统1994年在波兰举行纪念反法西斯华沙起义仪式上再次诚恳地向波兰人民谢罪,在参观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时说:“人们不会忘记纳粹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的惨剧,德国决不允许右翼

恢复第三帝国。”1995年在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50周年大会上讲话提出:“不要忘记历史,排斥历史,并且应该保持警惕。”1999年1月12日再次在联邦议会特别会议上强调,法西斯主义是德国一段十分可怕的历史,每个人都不应该忘记,“都应当承担起特别义务,防止大屠杀及奥斯维辛那样的事件再度重演”。1993年,值希特勒篡夺政权60周年之际,德国人民在勃兰登堡门前用烛光组成“决不允许法西斯卷土重来”的字样,表达了他们警惕法西斯的决心。

日本却是一个缺乏深厚哲学文化传统,崇尚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国家。它极力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并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政策所利用。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不久,便走上了疯狂侵略扩张的道路。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19世纪末提出了臭名昭彰的“大陆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军使用了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虐杀中国人包括老弱妇孺,其残忍和灭绝人性,在近代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日本的这种疯狂侵略扩张和残暴,没有外部逼迫的条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识的怪胎。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并没有从失败中总结教训,抛弃错误的旧态度,“采取扎根于国际协调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仍是一意孤行。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问题始终采取不提起、不表态、不回答的搁置政策。到80年代,随着经济、军事力量的增长,战后日本长期被压抑的大国意识复苏,“新国家主义”思潮出笼,“大和民族优秀论”再次泛滥。在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纲领后,其翻案活动更日盛一日。日本内阁大臣称南京大屠杀为“虚构”,把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性奴隶称为“商业行为”,否认侵略战争性质,把对外侵略说成是为了日本的“自存自卫”,是“解放亚洲”等。1995年,日本《财政界》登载“重新思考昭和之战”一文,提出日本应当从东京审判这种“定罪史观”中摆脱出来,“重新思考那次战争的意义”。难怪有良知的日本人士说,日本是一个

“不会反省的民族”。井上清、铃木正四在合著的《日本近代历史》中说:“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美国的乔治·弗里德曼和格雷迪思·勒巴德也说:“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日本的近现代史。

第四,所处的地缘政治不同

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地区,战败前夕,国土被盟军占领,军事上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战败后,被苏美英法四大同盟国分区实行军事占领,国家较长时期处于分裂状态,周围有英、法、前苏联等世界性强国的包围监视,受制约的因素较多。而日本是一个岛国,周边没有能对它真正构成威胁的强国。日本战败前,本土未遭到地面攻击,在海外尚存有100余万军队,手中保留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成为美国考虑保留天皇制问题的交换条件。日本的投降过程和投降事宜的安排,实际上是由美国政府控制下完成的,使美国有条件按照美国的意愿来重建日本。随着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日渐失败和苏、美冷战的加剧,扶日问题日益成了美国远东战略的重要内容。于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放宽了对日经济的限制和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没有彻底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残余势力,留下了复活的祸根。日本也把美国离不开日本作为可资利用的一大资本,而并不十分看重亚洲国家。另外,日本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少数人对外扩张的野心不会泯灭。

综上所述,日本在反省二战罪责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不是孤立和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和传统文化根源。日本的不认罪、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事件不仅过去发生过,今后还将继续发生。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与之进行不懈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防止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为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作出贡献。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

编辑:陈宇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 德国
侵略战争罪反省